

汪 晖 著

去政治化 的政治

短20世纪的终结 与90年代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亚洲想象的政治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去政治化的政治

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

汪 晖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D602
W3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 / 汪晖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5
(当代批评)
ISBN 978-7-108-02852-5

I. 去... II. 汪... III. 政治-研究-中国-现代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4372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33.75

字 数 465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40.00 元

序 言

“90 年代”诞生于 1989—1991 年的世界性巨变，它绵延伸展，越过了人们用以标记时间的段落。在我的用语中，“90 年代”与 1990 年代并非完全重叠，前者指称从 80 年代末叶发展至今的一个进程，其特征是市场时代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巨变，而后者只是一个时间的标记。就思想的变迁而言，大约到 1990 年代的中期，中国知识分子才从前一个震荡中复苏，将目光从对过去的沉思转向对我们置身的这个陌生时代的思考。这是一个诞生于 1989 年的大震荡之中的早产的婴儿，却必须面对空前剧烈的社会重组。也许会像许多时代的终结一样，“90 年代”的离去需要一个事件作为标记，但也很可能，在这个序幕式的时代与正式的剧情之间并无严格的分界，它成立的标志正是暧昧的绵延。

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是：“80 年代”是以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形式展开的革命世纪的尾声，它的灵感源泉主要来自它所批判的时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等被视为典型的“80 年代的论题”，其实没有一个不是来自 50、60 和 70 年代的社会主义历史）；而“90 年代”却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新的戏剧，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若不加以重新界定，甚至政党、国家、群众等等耳熟能详的范畴就不可能用于对这个时代的分析。因此，尽管两个年代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后者绝不是前者的自然延续。在“90 年代”，不同的思想力

量与新自由主义的对峙成为重要的思想事件——新左派的崛起，后现代思潮的起伏，保守主义的渗透，民族主义的消长，以及自由主义的流行，每一个潮流都包含着含混的趋势，若不能将它们置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盛、衰落或转型之中加以诠释，我们就弄不清它们的真正方位。透过思想对峙的态势和媒体中的混战状态，我们不但发现一系列具体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以公共讨论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也发现有关当代问题的所有争论都不可避免地涉及重估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传统——“90 年代”的另一个醒目的标志是 20 世纪形成的价值系统和历史观的深刻危机，不要说革命时代和社会主义历史所提供的价值，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80 年代命题”也没有多少相干。在我们追问“90 年代”的含义之时，也不免好奇：“20 世纪”究竟是包裹在“漫长的 19 世纪”内部的他者，还是通过革命催生 21 世纪的幽灵？

由于“90 年代”的诞生与 20 世纪历史的分崩离析相互重叠，一个奇异的景观恰好是：这一时代看起来与“漫长的 19 世纪”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而与“20 世纪”相距更加遥远。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技术的长足进步，全球化过程的深化，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的迅速攀升，以及美国霸权日益显露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战争，军事遏制战略，“反恐”军事联盟，农民、农村和农业的普遍危机，传统工人阶级的解体与新工人阶级（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形成。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我们见证了市场社会如何将教授、医生、律师、诗人、学者、艺术家、媒体工作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语），见证了社会主义实践力图压抑的各种社会要素如何破茧而出，成为新秩序的基础——伴随 20 世纪的大幕落下，那些构成“19 世纪”之特征的社会关系重新登场，仿佛从未经历革命时代的冲击与改造一般。在这个意义上，“90 年代”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毋宁更像是“历史的重新开始”。

历史（尤其是 19 世纪意义上的历史）以一种重复的形式延续，但重复总是昭示着差别。冷战的终结与革命的终结相互重叠意味着这个时代既

不是 19 世纪的跨越式延伸，也不可能简单搬用 20 世纪的政治模式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19 世纪的大转变创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内部敌人，即无产阶级和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最终发展成为一种以社会主义党一国体制为基本形式的、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外部的体系；而 20 世纪末叶的大转型却是以这一资本主义的外部体系的终结为标志的——不但是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而且也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政党政治等传统政治形式的大规模衰落。为了探索这个新的局势，中国的知识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标志性论题（诸如市场化、全球化、民族主义、“文明冲突论”、“人文精神”、后殖民主义、制度创新、国家能力、城市化和农民工、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三农危机、医疗保障体制危机、住房体制危机和劳动权利危机、后现代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性的反思、人文教育和大学改革等等），即便我们可以在“80 年代”的学术研究和文化讨论中能够找到与这些论题相关的蛛丝马迹，“90 年代”的主题、方法、视野和规模也已经与先前的时期划出了清晰的界限。要弄清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至少需要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冷战的终结与革命的终结相互重叠？为什么“90 年代”不是“短 20 世纪”的尾声，而更像是“漫长的 19 世纪”的延伸？

收录在这部文集的论文全部产生于“90 年代”，最早的发表于 1994 年，最晚的发表于 2007 年。这些文章在发表之时曾经引起过不同规模和层次的讨论，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对于这些讨论做出系统的回应。为了把握这个剧变时代的脉搏，我不得不同时在几条线索上进行探索，既有近距离的追踪，也有长时段的观察，既有理论性的思考，也有具体介入。探索远未完成，但编辑这部文集的过程却让我意外地发现这些写于不同时期、回应不同问题的文本之间存在着比我预想的远为内在的联系和连贯性，它的出版也许能够帮助澄清我在个别文章中的某些论点的来龙去脉，说明我在这个时期集中阐述的一些命题（如反现代的现代性、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去政治化的政治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今天，90 年代的脚步正在迈向终点，过不了多久，它也会成为遥远的回忆。对于自己时代的思索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你选择了一种方式，也就意味着放弃许多其他方式。这本文集写作的年代正好与我编辑《学人》、尤其是《读书》的时期相互重叠，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其中的许多与我相关的人物、故事、漩涡和场景——即便是短短的十余年，已经包含着生离与死别、眷念与忘却。

对我而言，“90 年代”是一个至今面目模糊的时代，一个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加以穿透才能理解其脉络和逻辑、把握其感情的变动和价值的转变的时代。在完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之后，我的研究兴趣再次转向了“短 20 世纪”——这个转向与其说是前一个研究项目的延续，毋宁说是这本文集所留下的问题的催逼。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汪 晖

2008 年 3 月 11 日夜于荷清苑寓所

目 录

序言 1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 60 年代的消逝 1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58

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98

“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 161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言 231

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 275

附记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365

亚洲想象的政治 404

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新版序言 456

附录一 现代性问题答问 482

附录二 90年代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 512

附录三 金沙江之子

——追忆萧亮中 519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 60 年代的消逝

一 中国与 60 年代的终结

2005 年 8 月初，国立新加坡大学为庆祝百年校庆举行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其中一场的主题是“亚洲的 60 年代”。尽管中国的 60 年代在讨论中被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美国等国家的学者反复提及，但除了我本人应邀担任这场讨论的评议人之外，没有中国学者在这个场合发表论文。在我的经验中，这不是偶然的。1998 年，当全世界——欧洲、亚洲、美洲等等——都在纪念 1968 年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三十周年之际，中国这个与 60 年代关系极为密切的地方就对此保持了沉默。

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这一沉默的意义。我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是：这个沉默不仅是对 60 年代的激进思想、政治实践的拒绝，即不仅是对作为中国之“60 年代”的标记的“文化大革命”的拒绝，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中也隐含了对于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怀疑以至否定。我在这里所说的“20 世纪中国”指的是从辛亥革命（1911）前后至 1976 年前后的“短 20 世纪”，亦即中国革命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序幕大致可以说是 1898 年戊戌改革失败（尤其是 1905 年前后）至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的时期，而它的尾声则是 70 年代后期至 1989 年的所谓“80 年代”。^{〔1〕}中国革命的内容包罗

〔1〕 就政党和国家体制的转化而言，70 年代中期以降的理论争论延续至整个“80 年代”。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这一体制内争论的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新生力量的涌现和论题的转变，文化和政治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党—国体制内部。尽管这一时代的许多发展为 90 年代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奠定了基础，但就这个时代本身而言，我们仍然可以从党—国体制内部和体制外部发现充满张力的“政治文化”。

万象，但并非不存在核心内容，概括言之有三点：第一，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构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进而为现代中国政治奠定基础；第二，以革命建国为方略，通过对传统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将中国建立为一个主权的共和国家，进而为乡土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第三，阶级政治的形成和革命建国的目标既召唤着现代政党的产生，又以现代政党政治的成熟为前提。在这个时代里，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曾经先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楷模，而对这两场革命的不同取向也清楚地表达了中国革命之政治分歧：“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热情地赞颂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价值，而第一代共产党人以俄国革命为楷模，对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进行批判。在“80年代”，伴随社会主义危机和改革的出现，俄国革命的光环渐趋消失，法国革命的意义重新凸显，但随着这个革命世纪的终结，法国革命也与俄国革命一道作为“激进主义”的滥觞成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因此，对于60年代的拒绝和遗忘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持续性的和全面的“去革命”过程的有机部分——如果我对“短20世纪”所做的上述三点概括基本成立的话，“去革命过程”就必然表现为工农阶级主体性的取消、国家及其主权形态的转变和政党政治的衰落等等。

60年代的亚洲，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殖民主义时代正在终结；在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地区，大规模社会运动相继爆发，冷战和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秩序面临严峻挑战。6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反战运动和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批判风起云涌，战后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体制遭遇强烈质疑。但为什么60年代问题更像是一个西方的话题，而不是亚洲的话题？在给出更为深入的回答之前，也许下述两点值得提及：第一，西方的60年代与亚洲的60年代相互关联，但也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欧洲和美国的反战运动、反殖民运动基本上是西方社会内部的批判运动，它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是针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批判；与此相对照，在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支那）和其他的地区，60年代的

斗争具有深刻的针对西方殖民统治和国内社会压迫的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性质；如果说西方的60年代针对战后党—国体制（party-state or parties-state）及其内外政策提出了激烈的批判，那么亚洲的60年代（日本是一个例外，它的社会运动与欧洲的情况有着更多的相似性）则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武装斗争在霸权性的国际关系中重建独立自主的国家，即建立新型的党—国体制，谋求自身社会的改造和经济发展。在当代语境中，亚洲60年代的武装革命、军事斗争已经从人们对这一时代的记忆和思考中消失了——当跨国主义成为支配西方知识分子想象力的主导价值之时，60年代亚洲的独立运动和党—国建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即使在亚洲左翼对于60年代的社会运动的缅怀中，这一问题也难以构成重新思考60年代的中心主题。

第二是中国60年代的独特性质以及中国对自身的60年代的自我否定。从50年代开始，中国始终支持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和不结盟运动，并在朝鲜半岛和越南与世界上最大的强权美国相抗衡；当60年代的欧洲激进分子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实践之时，他们发现中国在更早时期已经与苏联正统路线进行了持久的理论和政治的斗争。中苏关系的变化直接起源于苏联的霸权诉求和中国对于国家主权的捍卫，但这一冲突不能一般地放置在国家间关系的范畴内进行解释，因为冲突本身凸显了两国共产党之间的政治对立和理论分歧。几乎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党—国体制确立之始，革命政治即面临“去政治化”的侵蚀，在国内方面，它主要表现为党—国体制的官僚化和以权力问题为中心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不但取消了党内的自由讨论和参与者的政治主体性，而且也以自上而下的权力体制压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其他社会阶层内部的批判性思考和社会运动；在国际关系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霸权构造最终形成和确立，不但阻碍各国社会主义者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也损坏了自主和平等的国际关系原则。中苏论战以一种理论斗争的形式展开，显示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对于政党与国家及社会主义方向的不同理解。

中国的 60 年代与中苏论战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自身的演变的担忧密切相关。〔2〕“文革”中提出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 大辩论大字报”试图通过大众参与突破党一国体制的框架，但由于这些斗争本身与群众运动内部的派性斗争和党一国体制内的权力倾轧纠缠在一起，导致了大规模群众暴力和政治迫害，早在 1976 年之前，60 年代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已经黯然失色。在 70 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合、毛泽东的逝世和失去权力的领导者重新登上权力舞台，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对于“文化大革命”给予了彻底的否定。1980 年，在对“文革”时代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清理之后，全国人大做了专门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所谓“大鸣大放 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3〕三十年来，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社会的模式，已经从一个“世界革命”的中心转化为最为活跃的资本活动的中心，已经从对抗帝国主义霸权的第三世界国家转化成为它们的“战略伙伴”和对手，已经从一个阶级趋于消失的社会转化为“重新阶级化”的（在很多人看来“更为自然的”或“正常的”）社会……从历史的角度看，对 60 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望、怀疑

〔2〕 从中苏论战到“文革”时期的一系列理论辩论都证明这两个政治运动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毛泽东发动“文革”，部分的原因产生于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演变的估计，即认为演变很可能直接产生于领导集团（如 1965 年 8 月 11 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和 1965 年八九月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出于对中央上层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修正主义的估计，毛泽东认为除了发动群众之外，没有别的办法阻止这一进程。正是这一群众运动的构想和实践使得毛泽东试图将“政治”从政党和国家的领域中解放出来。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详见下文的论述。

〔3〕 1985 年 5 月 20 日，邓小平在会见陈毅时将“文革”中的“四大”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了直接的关联，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 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 1980 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3—124 页。）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尽管在政治上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80 年代初期的以“社会主义的自我修正”为宗旨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文革”的政治传统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连贯性。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下文。

和根本性的否定构成了 70 年代至今的上述历史进程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当批判的知识分子试图对当代社会危机——三农危机、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的扩大，体制性腐败，等等——做出分析之时，针对他们的最为有力的武器就是：你们是要回到“文革”吗？这一“彻底否定”的姿态取消了任何对当代历史进程进行真正的政治分析的可能性。

我把 60 年代的消逝视为一种独特的“去政治化”过程。60 年代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它的最为重要的特征是打破战后国际体系的两极化和冲击战后两种不同类型的党一国体制，即陷于危机之中的以多党政治为特征的西方民主和以一党政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党一国体制。我们可以将这个时代的“政治化过程”放置在三个相互关联的进程中加以理解：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得原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基本解体，世界权力格局进入了以美国和苏联两大集团相互对抗的冷战时代。从 50 年代的万隆会议到 60 年代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和武装斗争在这个两极化的世界格局内部打开了缺口，形成了打破冷战的两极构造（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国际关系的“去政治化的权力架构”）的“政治化过程”。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就是对于这一新的历史形势和政治斗争的回应。第二，如果说民族解放运动打破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那么以中苏论战为开端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内部分裂则在东方集团内部提供了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未来和世界性的霸权构造的空间，这是通过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而展开的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日益僵化的（亦即“去政治化的”）权力格局的挑战，从而也可以视为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政治化过程”。第三，社会主义的内部分裂直接地导致了一种新型政治尝试的出现，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动“文化革命”，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遏制党一国体制的“异化”（或“去政治化”）——对于这一新型政治尝试的悲剧性后果需另做分析，但可以确定的是：离开对于社会主义党一国体制的深刻分析，我们是无法理解中国的 60 年代的，离开对于这个体制的重构和再确立，我们也无法理解中国的 60 年代的终结。

正如我在上文简略谈到的派性斗争、政治迫害，以及党—国权力体制的重新巩固所表明的，60年代内部包含着自我否定的趋势，即“去政治化的趋势”。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错综纠葛的局势及其对“后文革”时代的影响？

二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党—国体制

去政治化与政党政治的转变

关于6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有无数的学者进行了探讨。我在这里主要从“去政治化”这一命题出发，讨论中国的党—国体制及其转化问题。意大利社会学家亚历山德罗·鲁索（Alessandro Russo）对中国的“文革”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在一篇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How to Translate Cultural Revolution?”）中，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这个政治化时期的终结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源自70年代中后期，^{〔4〕}而是产生于“文革”开始后逐渐发生的派性斗争、尤其是伴随派性斗争的暴力冲突，亦即产生于60年代自身的“去政治化”：派性斗争和暴力冲突使得“文革”初期的公开的政治辩论、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政治文化濒于危机，从而提供了党—国体制重新介入并获得巩固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终结产生于一个“去政治化”过程。^{〔5〕}在鲁索看来，“去政治化”并不仅仅是“后文革”时代的中国现象，而且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的特点。

〔4〕 迄今为止的“文革”研究集中于北京、上海、武汉等中心城市，而对“文革”在全国各地不同发展进程缺乏翔实的考订。也因为如此，人们对于“文革”的终结究竟始于1968、1969、1976年或其他时期存在不同看法。但地区和时段上的差异并没有排除上述“文革”内部转化的基本逻辑。又，鲁索的文章已发表于*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7 No 4。

〔5〕 2004年底，应博洛尼亚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邀请，我在该中心担任了三个月的高等研究员。在此期间，我与Alessandro Russo教授和Claudia Pozzana教授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他们提供了包括“*How to Translate Cultural Revolution?*”在内的一些论文供我参考（该文即将与本文的英文本一道发表在最近一期的*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上）。“文革”与“去政治化”问题是我们阅读和讨论的中心议题。我在此向他们深致谢意。

统治权从传统的君主转化为现代的政党是政治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一党专政与多党政治均以现代党一国体制为基本框架，在这个意义上，上述两种国家模式均可称为党一国，概莫能外。“如果在现代写一部新的《君主论》，其主人公不会是一位英雄，而只能是一个政党。具体点说，是在各个不同时期，在各个不同民族的不同的内部关系中，致力于建立一个新型国家的那样一个党（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政党，这是历史的要求，理智的要求）。”〔6〕20世纪中国政治与政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建立不同类型的党一国体制始终是这一时代政治发展的基本问题，但政党政治并未全盘被纳入既定的国家政治的轨道。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政党政治总是按照自身的价值和理想投身于创造新型国家的政治实践，它们相互竞争，力图按照自身的面貌塑造社会。随着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逐渐地变成了国家体制的主体，政党与它们各自的社会基础的关系不再是清晰透明的，政党的政治理念与其政治实践的关系也日益缺乏内在连贯性。简言之，政党体制包含了双重转化，即，一、政党自身处于一个“去价值化”的过程之中，政党组织的膨胀和政党成员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扩大并不能代表政党的政治价值的普遍化；二、政党日益向常规性的国家权力渗透和转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去政治化的”和功能化的国家权力机器。我将这一双重演变概括为从“党一国体制”向“国一党体制”的转化：前者包含着一种政治性的态势，而后者则专注于权力的巩固。这一“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将20世纪产生的“党治”体制转化为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统治体制——尽管它不可避免地也是国家的政党化过程，但这一“政党化”过程与早期的政党扩张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原因是早期的政党扩张是一个政治过程，一个通过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而不断自我建构的过程，而在当代的政党国家化过程中，政党已经被视为一个亦已完成和定型的、与国家一样扮演着中立的、协调不同利益的功能的体制。在这个意

〔6〕 葛兰西：《狱中札记》，《葛兰西文选（1916—193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41页。

义上，政党的定型和完成亦即政党的终结。〔7〕

60年代的终结意味着经受了巨大危机的两种社会体制的重新巩固，但这一巩固过程是通过“去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的，从而势必动摇两种社会体制的政治基础。在政党政治衰败或转化的语境中，国家成为“没有政治的国家”或者“去政治化的国家”。为了说明这一新的政治局势，我们需要对两种政治体制的转化做简要的说明。经典的代议制民主被设想为以共同善或共同利益为目标的、通过集体参与以形成公共决定的方式。议会民主不仅具有倾听、观察和阅读社会成员的信息的能力，而且还具备以理性的和合乎逻辑的方式回应、质疑和检验这些信息的能力。在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社会自我决定的基本条件是信息的透明和人民与其代表之间的沟通。但是，这一以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核心的民主概念在现代时期受到严峻挑战，许多民主理论家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也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代议制，他们提出的是一种建立在政党政治基础上的民主概念（如凯尔森、熊彼得、当斯、达尔等）。〔8〕多党议会民主制也被看作是一种形式民主，它以理性对话和公共领域作为政治概念的核心。在这一民主的形式框架下，各种利益之间的博弈能够达成最终的均

〔7〕 葛兰西的如下论断在当代语境中仍然值得思考：“党永远也不会彻底定型和完成，但这是指每次进展都提出新的任务和责任而言，而在某些党看来，也是指下面这种怪论可以成立：到了这些党不再存在，也就是到了它们的存在在历史上成为多余的时候，这些党才算彻底定型和完成。这样看来，每一个党既然只是阶级的专门名词，那么，不言而喻，一个提出消灭阶级划分的党只有到它停止生存的时候，它才达到了彻底的自我完成，因为阶级不再存在了，从而阶级的体现者也就不再存在了。”同上，344—345页。

〔8〕 See Adam Przeworski: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Western Thought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Revis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006 Beijing Forum, pp.2—30. 括号中的民主理论家的主要著作有：Hans Kelsen: *La Democratie, Sa Nature-Sa Valeur*, Paris: Economica, 1988 (1929) and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2;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and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